

两岸政治文化异同与融合发展之道

◎邓小冬

摘要:台湾政治文化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和日本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而大陆政治文化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但也有传统政治文化、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成分。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之处为传统政治文化部分,差异方面,则可以区分为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台湾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两岸政治文化同属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系统,应寻求政治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两岸;政治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14)02-0056-05

大陆和台湾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上,两岸一脉相承。但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两岸政治文化又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本文分析两岸政治文化的差异、相似性,探讨两岸政治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道。

一、两岸政治文化的差异

1、政治认知方面

政治认知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总和,与政治知识的概念相近,政治认知是人们政治态度、情感乃至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1]台湾人的政治认知首先表现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并且呈现出混乱、复杂的局面。TVBS民意调查中心2013年6月的数据显示,当仅有认同台湾人或认同中国人两个选项时,认同是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分别占73%与17%。若可选择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时,认同两者都是、台湾人、中国人的分别占38%、55%、3%。^[2]数据一方面反映了台湾民众认知的复杂性、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台湾的认同大于中国。这与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分不开的。

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由于其一系列腐败行径,加上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台湾人对祖国的美好向往早已千疮百孔。两蒋统治时期台湾实行“戒严”体制,对大陆进行各种歪曲宣传,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又宣扬“两国论”“一边一国”“去中国化”运动,严重影响了台湾同胞的政治认知。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积极扩大两岸交流,重塑台湾民众的中国认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大陆民众的政治认知趋向于世俗化,即人们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有了较多的关注。同时也趋向于理性化,不再盲目的追求西方的民主文化,更强调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在认同方面,当今大陆民众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中共的政治领导和权威中心的认同。

2、政治情感方面

政治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政治基础上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性反应。^[3]台湾历史上几易其主,先后经历过西班牙人,荷兰人,明朝人、清朝政府、日本人、国民政府的统治。台湾人始

收稿日期:2014-03-20

作者简介:邓小冬,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福建 厦门,361005。

终处于被动局面,不能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台湾人形成了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被政客们所利用,声称台湾人要出人头地,所以部分台湾人才会形成与中国意识、中国情怀相对立的分离主义意识。台湾人对大陆的不认同,与台湾人的恐共心理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当局的反共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等在台湾人心中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了。因此,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不仅没有好感,而且甚至怀有敌意。同时,由于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政治上依附于美国和日本,台湾社会存在一种“崇美媚日”心理,对美国和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表现的尤其突出。^[4]

在大陆方面,民众拥护中共的领导,支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认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如2013年12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并与其它食客交谈的消息被发布在网上,引起网友踊跃点“赞”,跟帖不断,此事也高居12月舆情满意度第一名。^[5]反映了大陆民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同,对政府做法的满意。大陆民众的政治情感也体现在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与自豪感中。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当问到民众“当您目睹奥运赛场上奏响中国国歌、升起五星红旗时,内心感受是”这个问题时,绝大部分民众回答“比较激动”和“非常激动”,其中回答“比较激动”的民众占52.8%,回答“非常激动”的民众占29.2%。^[6]大陆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民众的政治心理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以自身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对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及贪污腐败等现象表示不满。如中共十八大以后,大陆反腐的频度很高、力度很大,在官员受调查案子中,有超过70%是来自民众或其他官员的举报,这也获得了很高的舆情满意度。^[7]

3、政治价值取向方面

政治价值取向或称政治评价,通常是指人们在基本政治认知、政治经验和直观的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思想与态度的升华,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群体意识、政治追求等理性思维和主张。^[8]当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革新以来,台湾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两蒋时期的国民党威权政治文化体系转变成多元化取向。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取向占据统治地位。台湾已经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表明台湾已经通过了“双翻

转测验”,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台湾确立了起来,反映了民众在不满意某一任政府时,会想到更换其统治者,而不是怀疑民主制度,推翻其政权。当前台湾民众政治价值观反映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要体现在以维持现状为主流。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急于解决两岸分歧问题,他们既不支持两岸立即统一,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倾向于维持台湾目前的状况,即保有某种程度的“自主与自立”。在群体意识上区分为“我群”与“他者”,把台湾建构成“我群”,把大陆建构成“他者”。

大陆民众趋向于一种极为实际的追求和实利主义,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的义利并重的价值观。^[9]主要表现在人们在讨论、认识某一项政策或规章制度的时候,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出发,趋向于理性化。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参与政治的要求不断扩大,传统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尺度受到强烈冲击,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受到肯定。民主取代专制、选举取代任命、法治取代人治、放权取代集权等成为人们的共识,合法化建设、权威认同等现代化理念渐入人心。^[10]大陆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民主性、法制性、参与性和稳定性成分越来越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评价政府的实际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自由等观念逐步融入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平等的认知也成为了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性

虽然大陆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其主导的政治文化,台湾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也是其主导的政治文化,但由于受千百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两者政治文化中也有很多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分,也就是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之处。

1、重人治,轻法治。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国家的兴亡同皇帝的好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强调君圣贤相,强调修身、德性。君主主要自觉地根据德和礼来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历史上关于人治和法治有过三次争论,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家和法家的争论便是其中一次。儒家主张人治,或者是德治、礼治,强调“以德治国”;而法家反对儒家的人治,主张法治,提倡“法、术、势”,强调“以法治国”“不分贵贱”。然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法家的“法”也只不过是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罢了。

2、重视伦常秩序。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就

是道德伦理、纲常秩序,三纲五常、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儒家学说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强调官贵民贱,君尊臣卑,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看作父子关系,承认父权政治,强人政治。同时,这种秩序也要求统治者要力求做到“圣贤之君”,民众要顺从依附于君主。因此,人们要维护纲常伦理,讲求慎独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

3、主张君主民本。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和君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是君主和臣民组成了政治体这一统一整体。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与象征,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11]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民本思想是以君主为主体的,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封建统治;而民主思想是真的以民为本,崇尚自由、平等,否定专制制度。

4、主张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强调家国统一,国家和家族在组织形式、伦常原则、权力结构上具有统一性。君主的统治形式便是家国合一,是一种家天下的思想。正是由于家国同构,在中国古代把国称为国家。认为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一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我国古代严密的家族制度、嫡长子继承、严格的宗庙祭祀等,就是家国同构的一种体现。

5、君子式政治文化。君子式政治文化是和愚民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政治是君子的事情,民无权过问。这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造成重大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政治疏离感,从而远离政治,把自己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强调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小人不能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君子是劳心求知,而小人则是劳力谋食。^[12]同时又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无暇顾及政治生活,这不但阻碍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也造成长期以来广大民众具有一种政治冷漠感。

6、权力本位。权力本位的实质就是崇尚权威,以权力为尊,唯上是听,唯权是从,把官员视为大家长、“父母官”,对官员感到畏惧,不敢过问政治,寄希望于明君、清官。集权式的专制扩展了臣民文化,君主的权力得到了极大地扩大,君主作为一大家长,其权力是无限的,民众要服从君主的统治。这种权力本位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活动,在这种思想的氛围里,权力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同时,

掌权者也会通过玩弄权术,排斥异己、任人唯亲等手段滥用权力,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都是权力本位的体现。

以上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两岸政治文化之中。在台湾,蒋介石去世以后,蒋经国自然的继任“总统”,开始了又一段威权统治时期。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虽然台湾的民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实行的是一种强人政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台湾目前虽然已进入民主巩固时期,但台湾社会仍普遍注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对法律规范等重视不够,如在各个地方存在的派系、台湾社会的族群政治,都是台湾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由此在台湾也出现了所谓关系社会、熟人社会现象:裙带之风盛行,人大于法,轻视法制并致使法制流于形式,法律制度也可以变通执行。^[13]陈水扁贪污案以及王金平关说案便典型体现了这一现象。在大陆,等级观念、地方观念、官本位意识、权利本位、权力过分集中等等,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此外,还有一些政治现象,诸如强调集体主义,讲究论资排辈,家长作风,圣人执政心理等等,在两岸政治生活中都曾出现过,这同样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映。

三、融合发展之道

1、加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政治互信,而两岸政治互信的根本在于同心,要实现两岸同心,就要两岸人民交心、通心。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就是实现两岸同心的有效途径。^[14]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框架,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呼吁,让文化引领两岸,其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具有融合的特性和功能,有追求统一、维护统一的强大生命力,也是两岸建立互信的共有的思想基础。^[15]

目前,两岸在经贸合作上签署了多项协议,建立了交流管道和对话机制。而在文化交流方面,则缺乏相应的机制。因此,两岸必须在文化方面不断搭建桥梁,建立两岸文教合作交流机制,签订两岸文教交流协议,使两岸文教交流制度化、规范化。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时双方都表示要积极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举办以文教交流为主题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探讨协商两岸文教交流协议。^[16]两岸同文同宗,文化相通,在大陆方面,有着广阔的市场,人才众多,而台湾方面则具有良好的创意和丰富的行销经验。因此,加强两岸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机制,不仅有利于实现两岸同心,增强政治互信,还有利于两岸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2、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基础是具有共同的利益。而目前两岸发展最密切的就要数经贸关系,这也符合两岸的根本利益。近几十年来,两岸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合作领域不断扩大。1990年大陆是台湾第九大贸易伙伴,而到了2007年,大陆就成为了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也成为了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一逆差来源地。^[17]总的来说,目前两岸政治分歧仍难以解决,经贸合作则往来密切,两岸关系发展呈现出了“政冷经热”的局面。针对目前这种情形,两岸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从低阶层政治范畴逐步解决高阶政治争议。

两岸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通过两岸经贸往来,可以增加两岸同胞的了解,增强互信,还可以为两岸政治分歧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目的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18]对于两岸的经贸合作,在制度设计上,两岸可以建立海峡两岸自由贸易区,逐步走向共同经济体,促进两岸政治上的密切统合。

3、加强两岸青年学子的交流

2011年7月12日,胡锦涛在“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主题联欢活动”时说:“青年代表着未来,推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青年,希望两岸青年一代接过发展两岸关系的接力棒,更加踊跃地投身到两岸交流合作,携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19]的确,两岸关系的发展要靠两岸青年,青年代表着两岸关系的未来。然而,2013年11月发生的“张悬事件”,引发两岸网友论战,则反映了两岸青年缺乏了解、感情淡薄,在价值观以及理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张悬事件”发生后,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郁琦于2013年11月6日表示,“会全力和大陆方面进行沟通,让对方了解这是两岸年轻人互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形,双方应互相体谅、包容”。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于11月7日针对该事件回应:“我们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多接触,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20]从两岸相关主管部门的回应我们就可以看出,“张悬事件”所代表的两岸青年的交流问题引起了两岸双方的重视。从政府层面应积

极为两岸青年交流创造条件,如举办青年论坛、就学历承认、联合办学等议题签订协议等,培养两岸青年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

4、创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的政治文化环境

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两岸政治文化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两岸目前政治分歧难以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政治文化差异。如台湾2006年终止适用的“国家统一纲领”的四大原则之一就提到,“中国的统一,应以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为宗旨”。这充分反映了台湾以民主法治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借口。

台湾先于大陆进行了政治改革,已由两蒋时期的威权体制转变为目前的民主体制。虽然台湾的民主政治存在很多弊端,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法制化成分逐渐增长,但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仍落后于经济发展,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即融合民主、自由、文明的政治文化环境。使两岸同胞之间能够加强沟通交流,两岸社会团体、政治之间能够增加政治互信,共同务实的面对两岸的历史与现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携起手来,创造有利于两岸发展融合的民主、文明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共同的民主自由法治观念,树立共同的文明价值观。

四、结语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框架,同文同宗。台湾的政治文化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大陆的政治文化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但同时两岸在政治文化上又存在相似性,即政治文化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分。两岸政治文化差异的缩窄对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两岸应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理念,加强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加强两岸青年交流、创造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实现两岸政治文化的融合,共圆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3][4][8]刘国深.台湾政治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5,13,18,21.
- [2]TVBS 民调中心 2013年6月两岸互设办事处民调[EB/OL].http://www1.tvbs.com.tw/FILE_DB/PCH/201306/g672f

wasoc.pdf.

- [5] 亲民、改革、反腐—本届政府形象拼图.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01/02/c_118803679.htm, 2014-1-2.
- [6][9] 梁莹.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77, 294.
- [7] 十八大后看反腐 [EB/OL]. <http://news.sina.com.cn/c/t/20121217/131859.shtml>, 2012-12-17.
- [10] 王运萍. 从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现状看当前政治启蒙的任务[J]. 中国政治, 2006: 8(30).
- [11] 马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J]. 文化研究, 2006: 8(147).
- [12] 曹维劲, 魏承思. 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31.
- [13] 王为. 台湾地区政治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135.
- [14] 两岸心通才能增进互信 [EB/OL]. <http://www.huaxia.com/thpl/sdfx/1535119.html>, 2009-8-17.

- [15] 林修祺. 两岸心通才能政治互信 [N]. 大公报, 2009-8-15 (19).
- [16] 胡锦涛同吴伯雄会谈 希望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EB/OL]. <http://news.sina.com.cn/c/2009-05-27/112015693896s.shtml>, 2009-5-27.
- [17] 刘艳. 新形势下两岸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前景[J]. 海峡科技与产业, 2011: (3)5.
- [18] 胡锦涛.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J]. 党建, 2008 (4): 6.
- [19] 两岸青年交流趋势良好意义重大 [EB/OL]. http://www.taiwan.cn/plzhx/hxshp/whshh/201107/t20110729_1942152.tm, 2011-07-29.
- [20] 张悬事件的反思 [EB/O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09/293346.htm#ixzz2spcPxzHc>, 2013-11-09.

责任编辑: 张颖

(上接第55页)之两面, 互为补益。但若分轻重缓急, 历史证明了沈宗瀚的坚持更加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实情。唯有先将“面饼”做大, 才有可能以较为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 国人思维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识正是由于物质产品(特别是食物)长期以来严重匮乏所导致的畸形心理。

再者, 农复会在尊重现状的前提下通过各方协商的形式就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生产资料再分配达成妥协, 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自秦以降数千年历史始终未能走出的“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农民起义”的治乱循环, 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行土地改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农复会准确抓住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紧密嵌套关系, 通过土改授予大量无地或少地农民以土地, 从政治权利和土地所有权这两方面确立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逐步在农村培育了一个较为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改造旧有农会组织, 使其成为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制动闸”, 有效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以和平手法将农村中大地主的注意力渐次转至中国传统社会下一直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 为台湾的工业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 从根本上扭转了延续几千年的“重本轻末”思想, 为台湾培育工商社会, 完成从传统意识向现代性转变奠定了思想基调。

最后, 农复会找到了一条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建设农村的正确道路。农复会的经验表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掌握了现代科技武器的知识分子, 但知识分子若想发挥作用则要从农民需要出发服务农村, 一点一滴取得进步而非空谈乌托邦式的宏伟蓝图。若将视界放宽, 农复会仍隶属于那个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改造中国农村这一问题上孜孜求索的伟大传统, 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历史系谱中却最为闪亮和光彩夺目, 值得后人铭记!

参考文献:

- [1] 黄俊杰.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2] 徐世荣. 土地政策之政治经济分析——地政学术之补充论述[M]. 台北: 正扬出版社, 2001.
- [3] 党国英. 农村改革攻坚[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 [4] 于宗先、王金利. 台湾土地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 [5] 蒋梦麟. 西潮与新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徐映奇